消费者行为对财政政策的异质反应
——以城镇分层收入者为例

贺京同，那　艺
（南开大学 经济研究所，天津 300071）

摘　要：对于财政政策与居民消费的关系，主要存在凯恩斯观点、生命周期观点和李嘉图等价命题三种研究视角。但对中国而言，当前的转型经济环境将使现实中符合上述三种视角的居民会同时存在，亦即不同消费群体对财政政策的反应是异质的。文章构建了一个扩展的生命周期理论框架，其中凯恩斯观点和李嘉图等价命题均为这个框架下的特殊形式，从而为消费者行为对财政政策的异质反应提供了一个理论性的解释。此外，文章将我国城镇居民按收入等级分为五组进行相关的经验检验，发现各居民户组对财政政策的反应模式大致按收入水平由高到低表现为李嘉图等价情形、扩展的生命周期情形和凯恩斯情形，这意味着财政政策的制定对各收入阶层的居民具有歧视性效果。文章最后从优化政府购买的支出结构和调整当前税制结构两个方面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以刺激国内居民消费的增长。

关键词：财政政策；居民消费；收入分层；异质反应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9)04-0084-13

一、引　言

财政政策与消费者行为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是消费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探讨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可能造成的各种影响，具有很强的政策涵义。在现代经济学中，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视角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视角主要体现在凯恩斯的短期消费理论之中，我们将之称为凯恩斯观点。该观点认为，居民基于当期可支配收入来决定消费预算，因此当期的净税收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变量。此外，由于个人资产在凯恩斯的消费函数中主导着居民自主消费的大小，而国债被假定为个人资产的一部分，因此国债也对居民的自主消费产生影响。但政府购买却不能直接影响消费，它的影响是间接的，即通过乘数效应来提高均

收稿日期：2008-11-0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77305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7JJD790136）
作者简介：贺京同（1961—），男，北京人，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那　艺（1979—），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

衡产出从而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刺激居民消费的增长。

第二类研究视角以生命周期假说为理论依托,主要以 Ando 和 Modigliani 的文献为代表,我们称之为生命周期观点。这类观点假定:居民消费由于受持久可支配收入主导,因此各期税收就成为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但居民却对决定税收的政府预算约束不予考虑,这意味着居民忽视了国债与税收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国债仅被视为个人资产的一部分,它对消费的影响独立于税收对消费的影响。此外,忽视政府预算约束还意味着政府购买被排除于消费的影响因素之外。

第三类研究视角是由 Barro 重新表述的李嘉图等价命题,其主要论点是,政府购买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变量,而政府采取怎样的融资方式却对居民消费没有影响。其基本逻辑是,居民在进行消费决策时,会考虑来自所有渠道包括政府部门的商品和服务,即政府购买会直接给居民带来效用,这意味着居民的消费行为将受到自身预算约束与政府预算约束的共同影响,这被 Kormendi 称为"合并性观点"。同时,居民的前瞻性是无限期的,因此能够意识到任何国债最终都将通过征税来还本付息,于是国债不再被视为资产,而消费对税收与国债的变化将不再敏感。

上述三种观点各有其假定支撑和逻辑体系,而哪类观点是对现实的良好近似则有赖于经验检验。由于第一、第二类观点结论较为接近,因而一般将这两派观点统称为"非李嘉图"观点,并通过考察居民是否将国债视为净资产来判定该观点能否成立,如 Kochin 以及 Tanner 等人的研究是该方面的代表。而对于李嘉图等价命题,其成立的主要依据是政府购买是否对居民消费具有直接效应,对此,Bailey 和 Aschauer 等学者专门进行了探讨。而 Seater 从检验方法和数据处理等方面对相关研究做了对比总结,认为虽然已有的检验还不足以证明李嘉图等价命题的完全正确性,但是该命题目前所得到的经验支持已足够说明它比"非李嘉图"观点能更好地描述现实。但是这个结论主要得自对西方各发达国家的数据检验,对于我国来说还必须进行专门考察。

然而,国内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结论却分歧甚大。宋福铁通过对改革以来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国债融资对私人部门投资不具有挤出效应,这符合李嘉图等价命题的推论。李广众运用一个差分模型进行了有关税收、国债以及两者联合变量的缺省检验,发现税收和国债不是居民消费的重要解释变量,这也支持了李嘉图等价命题的成立。然而,王劲松从资本市场完善程度以及税收结构等方面对政府的融资效果进行了分析,认为李嘉图等价命题在中国是无效的。宋永明和梁春满建立并检验了一个公债管理政策的无效性假说,发现支持该假说的大多数前提条件与现实不符,因此政策无效性在实践中不能成立,这也间接说明李嘉图等价命题在中国的失效性。

西方各国的数据之所以能够大致支持李嘉图等价命题,是因为该命题所

依赖的前提在西方各国能够得到较好的满足，比如相对完善的资本市场、居民较强的前瞻性以及总量税为基础的税收结构等。而对于我国来说，当前的转型经济特征意味着，李嘉图等价命题所基于的前提假定很难得到完全满足，经济体制改革给社会各层带来的冲击可能会导致居民的决策出现各种短视现象或呈阶段性特点。但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定，也不排除在某些层次范围内消费者行为已展露出一定的李嘉图等价特征。这说明在我国现阶段，消费者行为对财政政策的反应可能具有异质性，亦即符合"非李嘉图"观点和李嘉图等价命题的消费者可能同时存在，而如果在政策制定中忽视各消费群体的异质行为模式，则必然会使政策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为了完整考察各种财政政策变量会使消费者产生怎样的反应，在下文中，我们首先建立一个能够涵盖上述三类观点的跨期决策模型，以期从理论上解释我国消费者行为对财政政策的异质反应。其次，我们以城镇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城镇分层收入者的消费行为，来验证我们所提出的异质命题，并根据财政政策对各收入居民的异质影响效应，给出若干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消费者决策行为的异质性：基本理论模型

为了能够构造一个涵盖各类观点的跨期消费模型，我们的办法是在生命周期模型中考虑 Kormendi 的"合并性观点"，这实际上是对上文中第二类和第三类理论观点的综合。Modigliani 和 Sterling 最早对这种综合方法进行了尝试，其目的是为了使生命周期观点的解释更为合理化。他们将政府预算约束纳入了消费者的决策依据，从而使政府购买、国债和税收同时成为居民消费的解释变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生命周期观点对政府购买行为的忽视。但他们在分析中却回避了政府购买能够直接影响居民消费效用的事实，因而政府购买仅以影响政府税收的间接方式来影响消费需求，亦即扩大政府购买，将扩大最终税收，从而抑制个人消费，这说明他们只是部分地接受了 Kormendi 的"合并性观点"，从而使政府购买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流于简单化和片面化。有鉴于此，我们在 Modigliani 和 Sterling 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政府购买对消费者的直接效用。由 Aschauer 的基本模型，我们首先导出确定性条件下满足居民跨期最优消费的欧拉方程。假定居民在时期 t 面临的期望效用函数可表示如下：

$$U_t = \sum_{i=0}^{K} \beta^i u(C^*_{t+i}) \tag{1}$$

其中：$u(\cdot)$为凹效用函数，β 为主观贴现因子，K 为决策期数，C^*_t 为居民的"有效消费(effective consumption)"，Bailey 将它定义为：

$$C^*_t = C_t + \theta G_t \tag{2}$$

其中：C_t 为每期的私人消费，G_t 为每期的政府购买，系数 θ 表示 C_t 与 G_t 之间具有简单线性关系，它意味着一单位政府购买与 θ 单位私人消费所带来

的效用是相等的,对应不同的 θ 值,C_t 与 G_t 的关系可分别为替代关系($\theta>0$)、互补关系($\theta<0$)或不相关关系($\theta=0$)。这样,我们就把政府购买纳入了居民的效用函数,亦即居民能够认知到政府购买所带来的直接效应。

政府购买对居民消费的直接效应是复杂的,其原因是不同类别的政府购买与居民消费呈现不同的相互关系:有些为显著的替代性,比如兴建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种社区便民服务等,这些购买项目无疑可直接取代居民在此方面的消费支出;而有些则表现为互补特征,比如政府对公共交通的建设、对社会治安的维护等,这些购买项目为居民营造了更为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从而增强了居民在相关方面的消费意愿(比如旅游等)。甚至有些购买项目兼具替代性和互补性的特点,比如政府对居民医疗设施的投资,节省了居民的某些医疗支出,这同时又增强了居民对其他付费医疗的支出意愿。因此,政府购买与居民消费的最终关系受到各种购买类别的综合效应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写出居民的总现值约束条件:

$$\sum_{i=0}^{K}(1+r)^{-i}C_{t+i}=W_t+\sum_{i=0}^{K}(1+r)^{-i}[Y_{t+i}-T_{t+i}]\text{①} \tag{3}$$

其中:Y_t 为劳动收入,T_t 为税收总额,r 为收入的折现率,W_t 为 t 期初居民的资产存量。联立(2)、(3)两式,居民有效消费的总现值约束可写为:

$$\sum_{i=0}^{K}(1+r)^{-i}C^{*}_{t+i}=W_t+\sum_{i=0}^{K}(1+r)^{-i}[Y_{t+i}-T_{t+i}+\theta G_{t+i}] \tag{4}$$

Kormendi 的"合并观点"认为,当居民能够认知到政府购买对其带来的直接效用时,他会将政府的预算约束也作为其决策依据。借鉴 Modigliani 和 Sterling 的方法,政府的动态约束可写为:

$$T_t=G_t+\gamma B_t-D_t \tag{5}$$

其中:B_t 为 t 期初居民所持有的国债,γB_t 表示 t 期初政府债务对居民的利息支付,且 $\gamma<1$,D_t 为本期的政府赤字,我们定义 $B_{t+i}=B_t+\sum_{j=0}^{i-1}D_{t+j}$,因此可把各期总税收的现值形式写为:

$$\begin{aligned}\sum_{i=0}^{K}(1+r)^{-i}T_{t+i}&=\sum_{i=0}^{K}(1+r)^{-i}(G_{t+i}+\gamma B_{t+i}-D_{t+i})\\&=\sum_{i=0}^{K}(1+r)^{-i}G_{t+i}+\gamma B_t\sum_{i=0}^{K}(1+r)^{-i}+\\&\quad\gamma\sum_{i=0}^{K}\sum_{j=0}^{i-1}(1+r)\lambda_{j+1}D_{t+j}-\sum_{i=0}^{K}(1+r)^{-i}D_{t+i}\\&=\sum_{i=0}^{K}(1+r)^{-i}G_{t+i}+\lambda_0B_t-\sum_{i=0}^{K}(1+r)^{-i}(1-\omega_i)D_{t+i}\end{aligned} \tag{6}$$

其中:$\lambda_i=\gamma\sum_{j=i}^{K}(1+r)^{-j}$ 且 $w_j=(1+r)\lambda_{j+1}$。将(6)式代入(4)式,得到:

$$\sum_{i=0}^{K}(1+r)^{-i}C_{t+i}^{*}=W_t-\lambda_0 B_t+\sum_{i=0}^{K}(1+r)^{-i}[Y_{t+i}+(1-\omega_i)D_{t+i}+(\theta-1)G_{t+i}] \tag{7}$$

根据(7)式,对(1)式所示的目标函数求解最大化问题,可导出欧拉方程为:

$$u'(C_t^*)=[\beta(1+r)]^{-1}u'(C_{t-1}^*) \tag{8}$$

若假定边际效用的每期变动率都很小,则有:

$$C_t^*=\rho C_{t-1}^* \tag{9}$$

其中:$\rho=[\beta(1+r)]^{\sigma}$,且 $\sigma=-u'/C^* u''$ 为不变的跨期替代弹性。将(9)式代入(7)式,并迭代掉 C_{t+i}^*,我们就得到居民当期最优消费的表达式:

$$C_t=\frac{W_t-\lambda_0 B_t+\sum_{i=0}^{K}(1+r)^{-i}[Y_{t+i}+(1-\omega_i)D_{t+i}+(\theta-1)G_{t+i}-\theta\rho^i G_t]}{\sum_{i=0}^{K}(1+r)^{-i}\rho^i} \tag{10}$$

进一步定义 T_t^* 为政府的净税收,它是税收总额扣除所有转移支付之后的余额,则有:

$$T_t^*=T_t-\gamma B_t=G_t-D_t \tag{11}$$

设 $W_t=A_t+B_t$,其中 A_t 为国债之外的其他资产,由此(10)式最终可写为:

$$C_t=\frac{A_t+(1-\lambda_0)B_t+\sum_{i=0}^{K}(1+r)^{-i}[Y_{t+i}-(1-\omega_i)T_{t+i}^*+\theta(G_{t+i}-\rho^i G_t)-\omega_i G_{t+i}]}{\sum_{i=0}^{K}(1+r)^{-i}\rho^i} \tag{12}$$

(12)式其实是对生命周期观点加入政府行为之后的一般表述,它所揭示的是,居民的当期消费受到政府债务、净税收以及政府购买的共同影响。仔细分析(12)式可发现,当 K 越大时,国债变量与税收变量的系数绝对值将越小,这说明当居民的决策期限延长时,国债作为个人资产的身份将被居民逐渐弱化,而消费也将逐渐失去对净税收的敏感性,这意味着当居民的前瞻性加强时,居民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国债与未来税收负担的内在关系,而他的消费决策特征也将愈加接近于李嘉图等价命题。另外,(12)式还表明政府购买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可分为直接效应 $\theta(G_{t+i}-\rho^i G_t)$ 和间接效应 $-\omega_i G_{t+i}$ 两部分,其中间接效应是通过影响各期总税收而导致的,为严格的负效应,而直接效应是未知的,由客观经济环境所决定。

为了便于进一步看出(12)式所暗含的意义,我们假设居民的效用函数满足二次曲线形式,于是有 $\sigma=1$。此时我们考虑两种极端特例情形。首先,如果假定 $\theta=0$ 且 $(1+r)^{-i}\to 0$,亦即政府购买对居民消费无直接影响,并且居民受到了极强的流动性约束时,可以得到 $\lambda_0=\gamma$,$\omega_i\to 0$,则(12)式将简化为:

$$C_t=(\sum_{i=0}^{K}\beta^i)^{-1}[A_t+(1-\gamma)B_t]+(\sum_{i=0}^{K}\beta^i)^{-1}(Y_t-T_t^*) \tag{13}$$

(13)式作为(12)式的一个特例形式，它显示的是凯恩斯理论所描述的短期消费函数情形，其中 $(\sum_{i=0}^{K}\beta^{i})^{-1}<1$ 可视为边际消费倾向，$(\sum_{i=0}^{K}\beta^{i})^{-1}[A_t+(1-\gamma)B_t]$ 为居民的自主消费，它反映了除收入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包括居民对股票、债券和房屋等资产的所有权。在这个特例中，居民对未来收入流的认知是短视的，因此未将其纳入自身的消费预算之内，而只对当期的可支配收入敏感。但由于消费效用的折现因子 β 并不为零，所以居民不会将当期的可消费资源完全耗竭，而是在各期之间进行合理分配，故而他具有小于 1 的边际消费倾向。在这个特例中，政府购买虽然对居民消费未产生直接影响，但政府购买已经以乘数效应的形式间接地对 Y_t 产生了影响。

现在我们考虑另一个特例情形。若令 $\gamma=r$ 且 $K\to\infty$，亦即债券利率与收入折现率相等，并且居民的决策期数为无限期时，可得到 $\lambda_0=\omega_i=1$，此时(6)式所表达的总税收现值将变为：

$$\sum_{i=0}^{K}(1+r)^{-i}T_{t+i}=B_t+\sum_{i=0}^{K}(1+r)^{-i}G_{t+i} \tag{14}$$

(14)式显示，在各期政府购买流既定时，当期政府债务的增加将引致各期税负的总折现值增加，这暗含李嘉图等价命题的假定。由此，(12)式可简化为：

$$C_t=(1-\beta)\{A_t+\sum_{i=0}^{\infty}(1+r)^{-i}[Y_{t+i}+(\theta-1)G_{t+i}-\rho^{i}\theta G_t]\} \tag{15}$$

在(15)式所展示的特定情形中，个人资产中只有 A_t 部分对消费仍具有影响，这意味着此时居民已不再将所持有的国债看作个人资产。从该式可以明显看到，对于财政政策的各种变量，居民消费只受政府购买影响，而不再受净税收和政府债务影响，因而(15)式符合李嘉图等价命题所阐述的内容。此外，$K\to\infty$ 意味着在这个特例下，居民成为无限期的决策个体，这与 Barro 在阐述李嘉图等价命题时的假定相一致，因为在他的模型中，决策个体的代际遗赠行为意味着他的决策期限是超出其生命期的。由此可以认为，李嘉图等价情形是(12)式这个一般性的居民跨期消费函数的特殊形式。

这样，我们通过在基本的生命周期模型中引入政府购买和政府预算约束的影响，建立了一个含有异质行为信息的跨期消费决策模型，并得到结论：在一定情形下，政府购买、国债与净税收均是直接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我们将该观点称为扩展的生命周期观点，以此来区别于前述的较为片面的生命周期观点。此外，我们将凯恩斯消费函数与李嘉图等价命题纳为本模型的两个特例，这意味着在现实中，由于消费者决策行为的异质性，可导致符合凯恩斯观点、扩展的生命周期观点和李嘉图等价命题的消费者同时存在，他们的异质行为的加总决定了消费者整体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

三、居民消费对财政政策的异质反应：经验检验及其结果

(12)式是对扩展的生命周期观点的集中体现，因而是对各种财政政策变

量如何影响消费的基本估计式。然而,直接利用(12)式进行实证分析却有如下困难:其一,该式中涉及了未来各期的税收变量和政府购买变量,这很难在当期进行合理估测;其二,居民所持有的个人财产在现实中也很难进行准确度量;其三,该式中由于涉及的变量较多,可能会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其四,用该式进行估计,我们难以区分政府购买对居民消费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而我们主要感兴趣的正是这种直接效应,因为间接效应是通过税收的变化而产生影响的。考虑到这些问题,我们的办法是从(8)式的欧拉方程出发,这样就可规避上述困难,并直接导出政府购买与居民消费的直接关系式进行估计,然后再加入国债变量和税收变量来对财政政策的整体效果进行估计。

我们主要以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作为研究对象。为了验证居民消费行为的异质性假设,我们将城镇居民按收入等级分为高收入户、中上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下收入户、低收入户五个样本组,分别对各组样本进行实证分析。[①] 根据上文所述,我们在计量估计中所涉及的变量包括人均政府购买、人均国债变量、人均净税收变量和各组人均非耐用品消费支出等。我们所采取的数据均为对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整理而成,样本范围为1985年至2006年,所有数据均为年度人均值,并以1985年的不变价格进行计算。

(一)政府购买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异质影响。首先,根据(8)式,并考虑不确定性情形,则有:

$$E_t[u'(C_t^*)]=[\beta(1+r)]^{-1}u'(C_{t-1}^*) \tag{16}$$

根据Hall,我们能得到:

$$E_{t-1}C_t^*=\rho C_{t-1}^* \tag{17}$$

将(2)式代入(17)式有:

$$C_t=\rho C_{t-1}-\theta G_t+\rho\theta G_{t-1}+\theta(G_t-E_{t-1}G_t)+\varepsilon_t \tag{18}$$

$\varepsilon_t=C_t-E_{t-1}C_t$ 为白噪声项。令 $\upsilon_t=G_t-E_{t-1}G_t$,(18)式最终可展开为:

$$C_t=\rho C_{t-1}-\theta G_t+\rho\theta G_{t-1}+\mu_t \tag{19}$$

其中:$\mu_t=\theta\upsilon_t+\varepsilon_t$ 也为白噪声项。(19)式在实证检验上具有较大的便利性,它能够反映出政府购买通过效用函数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我们首先考虑如何合理地对(19)式进行实证检验。考虑一般性,我们在(19)式中加入常数项,可得到:

$$C_t=a+\rho C_{t-1}-\theta G_t+\rho\theta G_{t-1}+\mu_t \tag{20}$$

直接对(20)式进行估计可能会出现虚假回归问题,根据Karrs,我们必须考虑三种情形:其一,如果模型中的变量 C_t、G_t 均平稳,则可直接在水平值的基础上对模型进行检验;其二,如果模型中 C_t、G_t 为非平稳随机过程,但满足一阶差分平稳,则需要考虑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若存在协整关系,则仍可直接对模型进行估计;其三,若 C_t、G_t 间不存在协整关系,那么由于 C_t、G_t 均为一阶单整过程,则可判断其线性组合 C_t^* 必为包含单位根过程的

非平稳变量，此时我们可通过施加约束条件 $\rho=1$ 来对模型进行估计。

按照上面这三个情形的要求，我们首先对政府购买变量和五组城镇居民消费变量进行 ADF 单位根检验。表 1 给出了对各变量序列的检验结果，其中：C_{it}（$i=1,2,\cdots,5$）表示按人均收入由高到低排序的五组城镇居民户的人均消费支出，C_{0t} 表示总体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ADF_i（$i=1,2,3$）分别表示无常数项无趋势项、有常数项无趋势项、有常数项有趋势项的 ADF 统计值。在 ADF 检验中，模型差分项的滞后期数应足够多，以吸收误差项的自相关，表 1 的圆括号内给出了差分项的合理滞后期数。

表 1 显示了所涉及的各变量均为非平稳变量，但却都基本符合一阶差分平稳，因而接下来我们需考察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是否与政府购买之间具有协整关系。我们对各组居民户的消费支出与政府购买之间进行 OLS 回归，并对回归残差进行增项恩格尔—格兰杰（AEG）检验以判断其平稳性，从而考察序列之间的协整性。协整检验结果在表 2 中给出。

表 1　对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ADF_1		ADF_2		ADF_3	
	水平值	差分值	水平值	差分值	水平值	差分值
C_{0t}	2.87(1)	−0.88(1)	1.09(1)	−2.56(1)	−2.28(1)	−4.35(3)**
C_{1t}	3.22(1)	−1.09(1)	1.32(1)	−0.63(2)	−1.46(1)	−3.29(1)**
C_{2t}	2.83(2)	−1.26(1)	1.58(2)	−3.01(1)**	−1.71(1)	−3.88(1)*
C_{3t}	3.78(2)	−1.33(1)	0.76(2)	−3.38(1)*	−3.01(2)	−4.20(1)*
C_{4t}	3.66(1)	−1.45(1)	0.50(1)	−3.50(1)**	−2.28(1)	−4.15(1)*
C_{5t}	3.15(1)	−1.76(1)**	−0.12(1)	−3.46(1)*	−2.43(1)	−3.40(1)**
G_t	2.31(2)	−0.49(1)	0.84(1)	−1.80(2)	−1.30(2)	−3.53(3)**

注：* 表示在 5%的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 10%的水平下显著（下表同）。

表 2　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与政府购买的协整检验

协整回归：$C_{it}=\alpha_{i0}+\alpha_{i1}G_t+\mu_{it}$，对残差的 AEG 回归：

$$\Delta\hat{u}_{it}=\varphi\hat{u}_{it-1}+\sum_{i=1}^{N}\Delta\hat{u}_{it-1}+e_{it},i=0,1,\cdots,5$$

样本	AEG 统计量	残差回归的 DW 值	N
城镇居民总体	−1.62	1.95	2
高收入户	−1.97	1.95	2
中上收入户	−1.22	1.85	2
中等收入户	−1.17	1.72	2
中下收入户	−2.17	2.28	3
低收入户	−1.48	1.98	2

注：AEG 统计量在 5%和 10%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取自 Mackinnon 给出的协整检验临界值的响应面函数。其中 DW 值表明 e_{it} 基本不存在一阶自相关，符合模型要求。N 给出的是 AEG 回归中差分项的合理滞后期数。

根据表 2 中各组样本的 AEG 统计量进行协整分析，发现无论是城镇居民总体还是各组居民户的消费支出均与政府购买均不存在协整关系，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在（19）式中约束 $\rho=1$ 来进行 OLS 估计。然而，考虑到 μ_t 可

能与模型中其他变量存在相关关系，从而导致有偏和非一致的估计值，因而在实施回归的过程中，可使用各内生变量的滞后值作为工具变量；此外，μ_t 可能与滞后一期的其他变量也存在相关关系，故将内生变量滞后两期和三期作为工具变量，并将工具变量设为：常数项、C_{t-2}、C_{t-3}、G_{t-2}、G_{t-3}、B_{t-2}、B_{t-3}。基本 OLS 估计以及采取工具变量后进行估计的结果见表 3 所示。

表 3　各组城镇居民消费与政府购买的差分估计结果

回归方程：$C_t - C_{t-1} = a - \theta(G_t - G_{t-1}) + \mu_t$						
(1)基本 OLS 回归						
	城镇居民总体	高收入户	中上收入户	中等收入户	中下收入户	低收入户
θ	−1.17*	−2.94*	−1.33*	−0.90*	−0.60*	−0.31
标准误差	0.217	0.702	0.286	0.206	0.170	0.184
t 统计量	5.38	4.19	4.64	4.39	3.56	1.70
(2)工具变量回归						
	城镇居民总体	高收入户	中上收入户	中等收入户	中下收入户	低收入户
θ	−1.07*	−3.06*	−1.41*	−0.98*	−0.68*	−0.48**
标准误差	0.240	0.534	0.323	0.254	0.226	0.203
统计量	4.45	5.73	4.35	3.87	3.01	2.37

表 3 所给出的两种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在基本的 OLS 回归下，还是在利用了工具变量之后的回归下，对城镇居民总体的 θ 的估计值均显著为负，结合前述协整分析可知，在我们所考察的时期内，虽然政府购买与总体城镇居民消费在长期没有协整关系，但在短期内却呈显著的互补关系，这与潘斌等的实证结果相类似。此外，通过对各居民户组的分别估计，可以看到这种互补关系除了对低收入户组不太显著外，其他各样本组的 θ 估计值均通过了 5% 的显著水平检验，并且均为负值，说明政府购买大致上对各收入等级的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均具有互补效应。然而，我们可发现 θ 的估计值对各收入等级的居民是显著不同的，其绝对值从高收入户组到低收入户组呈渐次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政府购买对不同消费群体的影响是异质的，基本呈现收入水平越低，政府购买对其消费的互补效应越弱的态势，并且对低收入户组甚至没有影响力。

（二）城镇不同收入群体对财政政策的异质反应。对(20)式所做的估计只反映了政府购买能否直接通过效用函数影响城镇居民的消费，还应当考察政府为了进行支出而实施的融资行为（包括征税和发行国债）是否也会影响居民消费，这才能完整地了解居民对各种财政政策变量的反应，并验证凯恩斯观点、扩展的生命周期观点与李嘉图等价命题在解释我国居民消费时的适用状况。为此，我们在上述回归中加入人均国债和人均净税收的一阶差分变量，来考察它们是否能够作为居民消费的解释变量。估计结果见表 4。

观察表 4 对各样本组的 θ 估计值，并分别与表 3 相对照，可发现在两种估计方法下，是否加入人均国债和人均净税收的一阶差分变量不会对 θ 估计值的大小产生多大影响，并且仍然保留了其绝对值随收入水平下降而逐渐递减

的特征，这说明我们模型的估计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进一步观察可发现，对于城镇居民总体来说，在两种回归方法下 φ_1 和 φ_2 的估计值均不显著，这意味着从整体上看，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基本符合李嘉图等价命题。

表 4　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对财政政策的反应

回归方程：$\Delta C_t = a - \theta \Delta G_t + \varphi_1 \Delta B_t + \varphi_2 \Delta T_t^* + \mu_t$						
(1)基本 OLS 回归						
分组	城镇居民总体	高收入户	中上收入户	中等收入户	中下收入户	低收入户
θ	−1.25*	−3.38*	−1.33*	−0.87*	−0.53*	−0.21
	(0.236)	(0.734)	(0.327)	(0.232)	(0.164)	(0.170)
	[5.31]	[4.57]	[4.07]	[3.73]	[3.20]	[1.25]
φ_1	−0.34	−1.54	−0.05	0.15	0.38**	0.47**
	(0.280)	(0.877)	(0.389)	(0.276)	(0.195)	(0.202)
	[−1.21]	[−1.75]	[−0.12]	[0.55]	[1.92]	[2.33]
φ_2	0.94	2.04	0.46	−0.49	−1.54**	−1.81**
	(1.088)	(3.409)	(1.512)	(1.074)	(0.760)	(0.785)
	[0.86]	[0.60]	[0.30]	[−0.46]	[−2.03]	[−2.31]
(2)工具变量回归						
分组	城镇居民总体	高收入户	中上收入户	中等收入户	中下收入户	低收入户
θ	−0.99*	−3.06*	−1.28*	−0.88*	−0.60*	−0.46
	(0.239)	(0.534)	(0.292)	(0.229)	(0.189)	(0.215)
	[4.13]	[5.74]	[4.37]	[3.86]	[3.17]	[1.51]
φ_1	0.47	0.53	0.80**	0.63**	0.59*	0.33*
	(0.276)	(0.616)	(0.337)	(0.264)	(0.218)	(0.187)
	[1.69]	[0.87]	[2.38]	[2.40]	[2.69]	[2.49]
φ_2	−1.33	−4.38	−2.39	−1.90	−2.11**	−2.01*
	(1.069)	(2.386)	(1.305)	(1.021)	(0.843)	(0.833)
	[−1.24]	[−1.84]	[−1.83]	[−1.86]	[−2.50]	[−2.42]

注：Δ 为差分符号，圆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差，方括号内数字为估计值的 t 统计量。

然而，对各样本组的分别估计却显示，各居民户组的消费行为对财政政策的反应却差异甚大，这验证了我们前述所提出的消费者行为的异质性假说。首先，收入越高的群体，其行为越符合李嘉图等价命题的描述。表 4 中的高收入户组、中上收入户组以及中等收入户组的消费行为基本表现出了李嘉图等价命题的特征，即只对政府购买敏感，但对国债变量和净税收变量基本不敏感或反应微弱。其次，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城镇居民，李嘉图等价命题失效。观察表 4，无论在哪种估计方法下，中下收入户组与低收入户组的 φ_1 和 φ_2 估计值均通过了 5%或 10%的显著水平检验，并且 φ_1 的估计值符号显著为正，表明国债存量的增加对这两组居民的消费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而 φ_2 的估计值显著为负，意味着净税收的增加会对这两组居民的消费产生负面冲击。这些估计结果揭示，李嘉图等价命题对于中下收入户组与低收入户组的城镇居民并不成立。此外，进一步观察可知，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城镇居民来说，其消费行为也呈现出了异质性特征。其中，中下收入户组的居民由于同时对政府购买、国债和净税收敏感，因而他们可以大致归为符合扩展的生命周期观点的个体类型；而对于低收入户组来说，θ 估计值始终不显著，这表明政府购买对该

组居民的消费行为没有影响,他们只对国债变量和净税收变量敏感,这符合凯恩斯观点所描述的主要特征。

四、结论与政策涵义

(一)主要结论及成因分析。本文以财政政策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回顾了经济学中对该问题的几种代表性理论观点,并通过对生命周期观点进行合理扩展,将凯恩斯观点和李嘉图等价命题的核心内容以特例的形式容纳在这个扩展的生命周期模型之内,表明在一定的客观经济环境下,符合这几种理论观点的居民会同时存在,消费者的决策行为具有异质性。为了验证这个异质性的行为假说,本文以我国城镇居民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改革开放后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对财政政策的反应特征,主要结论有二:

其一,政府购买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阶段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亦即政府支出与城镇居民总体的消费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前者对后者是一种"挤进"效应而非"挤出"效应,表明对于城镇居民来说,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为了刺激消费而实施的扩大政府支出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有效的。但通过将城镇居民按收入等级分为五组并进行考察,发现各组居民户对政府购买的反应程度是异质的:对于收入水平越低的居民户组,政府购买对其消费需求的直接促进作用也越低,其中对于低收入户组甚至没有这种直接效应,这暗示着政府购买支出的结构具有某种歧视性效果,亦即当前政府购买的支出项目只适合对收入较高的城镇人群发挥积极影响,而收入较低的人群却难以从中获取直接效用并增强消费意愿。

其二,城镇居民虽然在整体上满足李嘉图等价命题,但是不同的收入群体对财政政策的反应模式却显现出差异化特征,并且大致呈现这样一幅图景,即按收入水平由高到低逐渐从李嘉图等价情形过渡到扩展的生命周期情形,最后过渡到凯恩斯情形。这个结论基本上验证了我们对当前中国消费者行为异质性的推测。这种现象的基本成因是:一方面,我国当前还未形成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各种金融信贷服务体系尚不完善,居民的消费规划仍然较依赖于自身的收入流状况,如果收入水平较低,则容易蒙受一定的流动性约束,从而制约居民的决策期限,因此其行为特征符合扩展的生命周期观点;另一方面,高收入群体由于可以较好地规避流动性约束,并且具有较强的消费前瞻性和遗赠动机,因此他们对政府债务与未来税收的关系较为敏感,其行为接近于李嘉图等价特征;此外,对于处于最低收入水平的居民群体,往往意味着较高的失业率和较低的收入预期,并且面临着极强的流动性约束,其消费主要依赖于当前的可支配收入,这符合凯恩斯观点所描述的短期行为特征。

(二)政策涵义。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刺激居民消费、提高国内消费率是我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之一,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重要内容,必然将

发挥重要的职能作用。根据以上的研究结论,针对城镇不同群体所表现出的异质性行为特征,财政政策的调节手段也应当具备较强的针对性,以期得到有效的实施结果。具体而言如下:

其一,当前政府购买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促进效应,说明未来一段时期内扩大政府购买仍然是较为有效的刺激消费的方式之一。但从各收入群体对政府购买的反应情况来看,当前政府购买对各收入层居民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歧视性,这意味着政府购买的支出结构不尽合理,因而如何优化政府购买的结构以提高其刺激消费的能力也就成为政策调整的方向。应当着力加大政府购买对低收入群体的政策倾斜,尤其是一些涉及公共基础服务和免费或低价提供商品和劳务的支出,比如增强政府在基础医疗设施、初等教育等方面的投资力度等,以期能够解决低收入者生活的"后顾之忧",从而提高消费意愿。

其二,由于城镇高收入群体对税收和国债变量不太敏感,而低收入群体对其却较为敏感,这表明当前的税制结构对各收入层居民的效应也是歧视性的。为此,政府应当逐步推动各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比例趋于合理化,这一方面可通过调整或开征适当的税种如遗产税、资源税等来提高社会高收入者的税负,以使政府有能力在维持必要预算的前提下直接对较低收入者实施税收减免计划;另一方面还可通过加大对较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如健全包括失业救济、养老、医疗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等,以使较低收入者的净税收负担不断减少,从而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此外,还应积极开发适合较低收入群体的低风险高流动性的国债投资品种,以充分发挥国债对较低收入群体的财富效应。

注释:

①我们的数据主要依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的抽样调查资料,并将原资料中的最低收入户组与最高收入户组分别并入低收入户组与高收入户组,这样按收入划分的每个样本组的调查户数均占总调查户数的20%。

参考文献:

[1]宋福铁. 国债对于私人投资挤出效应的实证研究[J]. 财经研究,2004,(8):52—56.
[2]李广众. 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替代还是互补[J]. 世界经济,2005,(5):38—45.
[3]王劲松. 政府融资决策无效性理论及对中国的启示[J]. 财经研究,2002,(5):31—36.
[4]宋永明,梁春满. 公债管理政策有效性的理论分析[J]. 财经研究,2003,(8):15—21.
[5]尹恒,叶海云. 中国政府债务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J].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7):79—87.
[6]贺京同. 行为经济学与中国经济行为[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7]潘斌,罗新星,徐选华. 政府购买与居民消费的实证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2006,(5):68—76.
[8]L V Kochin. Are future taxes anticipated by consumers [J]. 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1994,(6):385—394.
[9]J J Seater. Ricardian equivalence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3,31(1):142—90.
[10]G Karras.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private consumption: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J]. 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1994,26(1):9—22.
(下转第106页)

lyzes the effect of health uncertainty on non-farming labor supply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by using the framework of utility function theory. Theoretical analyses show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ealth uncertainty there exists a phenomenon of precautionary labor supply, which can be significantly reduced by medical insurance. This theoretical predication about precautionary labor supply is supported by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study using CHNS data.

Key words: uncertainty; precautionary labor; medical insurance

（责任编辑　许　柏）

（上接第 95 页）

Idiosyncratic Response of Consumer Behavior to Fiscal Policy: A Study Based on Income Groups of Urban Population

HE Jing-tong, NA Y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ere exist three types of perspective to explain the relation between fiscal policy and consumer behavior, namely, Keynes theory, life cycle hypothesis and Ricardian equivalence proposition. But in China, due to the current economic transition environment, different consumer groups have idiosyncratic responses to fiscal policy. The paper builds up an extended model of LCH and provides a sound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the idiosyncratic response. It makes related tests by classifying urban population in China into five income groups and shows that the responses of citizen groups from high income to low income is featured by REP, extended LCH and Keynes theory respectively. It means that the design of fiscal policy has discriminatory effects on different income group.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 about optimizing the expenditure structure of governmental purchases and adjusting taxation system to stimulate the growth of domestic private consumption.

Key words: fiscal policy; private consumption; groups classified by income; idiosyncratic responses

（责任编辑　许　柏）